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谢春涛

核心阅读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其中,置于首位的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如果没有我们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没有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缺乏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就无法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种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我们党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0年前,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人民苦不堪言。今天,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既是对党负责,更是对国家、人民和民族负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50多名党员到9500多万名党员,从领导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党到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衷心拥护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人民在经过长期历史比较后,郑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选择一旦确定了,就始终坚定、从未动摇。人民是我们党执政

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不断得到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这一重大论断,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不断被实践证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能够实现对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武装力量等各有关方面的统一有效领导;党中央作出的决策,能够在各地区各方面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党的领导能够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和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彰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从实践中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第一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把“两个维护”确立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确定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坚持和发展,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对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画里有话

虚拟现实、智慧导览等技术,为观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高质量体验;举办配套“云展览”,打破博物馆服务时间、空间的限制;建立文物知识图谱与知识平台,提升博物馆教育质量,使文物真正“活起来”……随着各地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持续深入,博物馆发展将焕发更强大的活力。

这正是: 技术赋能展览, 升级参观体验。 激发文物活力, 再现历史变迁。 曹一图 廖沅文

我看我说

在把握历史大势中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

●王军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因而能够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顺应了社会义兴起的 world 发展大势。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也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我们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但从成立之日起就走在时代前列。经过艰辛探索,我们党找

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那时,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新中国就是沐浴着这个东风诞生并站住了脚的。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党对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科学判断,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正是这场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历史大势,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把握历史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

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

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

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34)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园地